

《庄子》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畸人形象

黄桂香¹, 周虹²

(1.西昌第一中学,四川 西昌 615000;2.西昌学院,四川 西昌 615013)

【摘要】《庄子》中塑造了大量的畸人形象,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身体上的残疾人;二类是心理变形的疯子。20世纪中国文学中也有这两类畸人形象,可看作是对《庄子》中畸人形象所表达的主题思想、文化意义等的继承和发展。

【关键词】《庄子》;畸人;20世纪中国文学

【中图分类号】B2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9)03-0055-04

何谓畸人?庄子借孔子的话传达出了他对畸人的看法,认为:“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1]p194}大意是讲,畸人就是异于世俗但合于自然的人。异于世俗之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外表异于普通人,如残疾人;二是心理异于普通人,如被正常人视为精神病类的狂人、疯子。《庄子》中塑造了大量的畸人形象,可据此分为两类:一类是身体上的残疾人,据统计,《庄子》中外表残疾的人有11个,他们是:右师(见《养生主》)、支离疏(见《人间世》)、王骀、申徒嘉、叔山无趾、哀骀它、闾趾支离无唇、甕盎大癭(见《德充符》)、子舆(见《大宗师》)、佝偻丈人(见《达生》)和支离叔(见《至乐》);二类是心理变形的疯子、强盗(也是疯子的一种)、社会越轨者。如《人间世》中的接舆、《杂篇》中的盗跖等。

20世纪中国文学中,也塑造出了一系列畸人,鲁迅的《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余华的《一九八六》中的中学历史教师,张洁的《七巧板》中的金乃文、废名的《菱荡》中的陈聋子、韩少功的《爸爸爸》中的丙崽、史铁生的小说中的残疾人和《尘埃落定》中的傻子等等,这些人物中既有精神上的畸人,也有身体上的残缺人。作为文学作品中的畸人,作家在塑造这些人物形象时,自然要传达出作家在这些人物身上寄寓的思想内涵,总的来看,与《庄子》中的畸人相比,20世纪中国文学中大量的畸人形象既有对《庄子》中畸人所表达的主题思想、文化意义等的继承,又有批判和发展。下面分别论述。

一 狂人或疯子

《庄子》中被人视为有精神病的是楚狂接舆和盗跖,楚狂接舆是以孔子的批评者的角色进入文本的。孔子适楚,楚狂接舆游其门曰:“风兮风兮,何如德之衰也!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福轻乎羽,莫知之载;祸重乎地,莫知之避。己乎,己乎,临人以德!”^{[1]p14}这个疯子毫不留情地批评了孔子之德以及他企图教人以德。孔子所竭力维护的

就是当时既定的秩序,用他的德、仁去维护即将崩溃的旧秩序,楚狂接舆直接就表明他这种追求是徒劳的。另外一个大胆斥骂孔子的人则是个强盗——盗跖。他将儒家所服膺的文武之道、所尊崇的圣贤忠臣、所提倡的道德规范,以及孔子的一切行为一笔抹杀,对儒家思想下形成的传统价值作了全然相反的评价。“丘之所言,皆吾之所弃也,亟去走归,无复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诈巧虚伪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论哉!”^{[1]p780}作为反儒的代表,庄子对儒家的思想言行显然是持否定态度的,而这些狂人批评的对象自然也就是儒家的代表人物,而庄子通过在一个儒家思想占主流地位的社会中的狂人来批评儒家思想,在庄子看来,狂人是正常人,狂人说出了社会的真理,而这真理正是庄子所推崇的。从这些人物形象看出,庄子借此来表达对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的反抗,也借此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可以说,楚狂接舆和盗跖是先秦文学中反抗既定秩序、反抗正统思想的典型,这类典型人物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中同样存在。

在我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也有不少狂人(疯子)形象,最有代表性的要算鲁迅和余华笔下的“狂人”形象了。1918年5月,鲁迅发表了《狂人日记》,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它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开端。小说中的狂人,患了精神病,被世俗称之为疯子,被哥哥强行关在家里并请来医生医治。作者以日记的形式对疯子的所作所为进行了十分逼真的描摹,通篇都是作者模仿疯言疯语记叙狂人发病期间的所见、所闻和所思,倘若在常规语境中来解析,它们就变成了颠倒世界的一派胡言。在狂人眼里,正常人的一些行为,变成了布置、合谋要害他,甚至连赵家的狗看他两眼,似乎也成为了要害他的同伙。一切合乎常规逻辑的事情在一根筋式的疑神疑鬼中都变成了迫害,变成了

大家合伙要吃他。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对疯癫进行了知识考古学的勘察。福柯认为,仅从病理学的角度来确诊疯癫的医学身份是不能够认清疯癫本身的真实内容的。疯癫决不是简单的病理现象,而是一种文明或文化现象,疯癫不仅仅是生理病变的产物,而且是文明或文化的产物。非理性的疯癫与理性构成了微妙的历史关系。“虽然疯癫是无理性,但是对疯癫的理性把握永远是可能的和必要的。”^{[2]p.97-98}狂人被视为为患了精神病,这是正常人靠理性得出的结论,而正常人是大多数,所以精神病这一命名就合理化了。可见,理性不仅强行地生产或命名疯癫,理性本身甚至就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所以,我们就不能把疯癫仅仅理解为一种理性的扭曲、丧失的错乱,而应该将疯癫理解为一种理性的眩惑,理解为另一种形式的疯癫。这样看来,狂人的疯言疯语不是胡说而是真理,它点破了旧礼教的实质。如,“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3]p.447}疯子的语言传达出一个极为严肃的现实:吃人的封建礼教正在吃人。而这竟然从人人视之为疯子的口中说出,更见其震惊了。可以说,作者在小说中就是要通过狂人对一切事物的怀疑和反抗揭示出封建礼教加在人身上的精神压迫。狂人既代表了一种先驱者的形象,也是反抗封建礼教、家族制度、传统的仁义道德,是宗法制社会的叛逆者,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第一个清醒者。

余华在他的小说《一九八六年》中,也塑造了一个“疯子”形象,他原是一位循规蹈矩的中学历史教师,在“文革”中被迫害成精神病人。从常人眼光看,他若无其事地对自己进行自残,“疯子用钢锯锯自己的鼻子,锯自己的腿”,他流着鼻涕、散发恶臭、自我行刑的情状让普通人真的以为这是一个疯子。无疑,他是时代、体制、教化和文明的牺牲品,他失去了妻子、儿女、家庭,失去了除了自己身体之外的一切。但他的服饰、刑具、夸张的动作、其癫疯的形象却又让人忍俊不禁。社会在不停地揉搓着个人的精神,而个人的肉体又在无尽地嘲弄着社会的可笑,疯癫与文明的角色在这里相互交换、重叠、唱和。主人公的出现导致了文明的贫血,他的妻子每天都把窗帘拉上呆坐在屋里,日渐消瘦下去,他的女儿也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但在小说的最后,当主人公成了干净的疯子的时候,这母女俩终于重新融入正常的文明生活,她们已经不再那么神经质

了。尽管疯子已经是个干净的疯子,但他仍然是个疯子。文明的社会可以让他外表干净,但文明的社会有能力使他不再疯癫吗?疯癫不是文明社会治理的手段和策略吗?但疯癫在这里岂不是又对治理提出了挑战?疯癫与文明的戏无休无止的演下去。罗兰·巴尔特认为:“疯癫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随时间而变的异己感”。疯狂的社会让个人与之发生强烈的对抗,这种对抗最终以个人被社会所吞噬结束,而在对抗过程中,疯子的产生就是对社会的否定。疯子的反常行为、思想、语言就是个人对强大社会的对抗,这种行为只有处于癫狂状态的疯子才干得出来。《一九八六年》中的疯子就是一位社会的无名小卒,但他的“表演”对社会构成了威胁,就是这么一位为人所鄙夷的小人物成为国家治理的障碍;这种深刻的反讽带来的是对国家正统意识形态的反抗与消解。从主人公一系列荒诞不经的表现中,读者所感受到的“文革”对广大中国人民的迫害的惨烈程度是不寒而栗的。“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极端疯癫的时代,以及这疯狂时代下所形成的非理性社会,亲手制造了种种疯癫。

因此,对20世纪文学中“疯子”形象的考察将有助于人们透过疯癫这一独特的视角,反思非理性及其背后的权力,在20世纪的中国究竟扮演着怎样的历史角色,对现存秩序的反抗形象是疯子在非理性的社会中的“突围表演”。从表演中让我们反思这个制造疯癫的社会。正如法国思想家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所言:“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癫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癫的历史。”而这种文明和历史显然是要加以拷问和反思的。从这一角度看,20世纪文学中的疯子显然有对《庄子》中的“狂人”形象的继承和发展。

二 身体残缺之人

除了精神上的“畸人”外,《庄子》中更多的是外表残缺的“畸人”。在《庄子·德充符》中,一共塑造了6个残疾人,全篇专门对残疾人作了描述,篇名“德充符”是对残疾人精神的高度概括。鲁国的兀者王骀,“从之游者,与仲尼相若”,但是他采用的是“立不教,坐不议”的教学方法,甚至孔子也想跟从他。恶人哀骀它,“丈夫与之处者,思而不能去也。妇人见之,请于父母曰:‘与为人妻,宁为夫子妾’者,十数而未止也。”乃至鲁哀公也信任他,并“授之国”。庄子认为,这些人物如此有魅力,并不在于外在的形体,更在于“用心”,就是由于不动心而达到了人生的平和状态,达到这种状态必须“忘”、“无情”。所谓的“知不可奈

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这些身体残缺之人,没有因为自己的残缺而怨天尤人,而是安于命运的安排,成为外丑内美的典型。这类人物形象,在现代文学中也有它的继承者。

废名的短篇小说《菱荡》中就塑造了一位残疾人形象——陈聋子。他是陶家村的长工,地位低下,别人忽略了他的姓,只称聋子。陈聋子是别人调侃他、嫉妒他送给他的外号。为什么会嫉妒他?因为耳不听,心不烦,不为外界所动,保持内心的平静。聋子善于自得其乐,能不为外界所动,保持内心的平静。所以,“大家都熟识这个聋子,喜欢他,打趣他,尤其是那帮洗衣的女人。”他干活任劳任怨,有求必应,“二老爹的园地是他种,园里出的菜也要他挑上街去买。二老爹相信他一人,回来一文一文的钱向二老爹手上数。洗衣女人问他讨萝卜吃——好比他正在萝卜田里,他也连忙拔起一个大的,连叶子给她。不过问萝卜他就答应一个萝卜,再说他的萝卜不好,他无话回,笑是笑的。”聋子的生活是一种内心的满足。聋子歇气抽烟,主人从不啰唆他偷懒,下湾的黄四牛理解为“一年四吊毛钱,不吃烟做什么?何况聋子挑了水,卖菜卖菱角!”意思是聋子付出多,回报少,有权力抽烟。黄四牛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聋子却没有这许多计较。“聋子总是这样的去摘菱角,恰如菱荡在菱荡圩不现其水”,本着自然之心去劳作的,自然之心不是机心,所以他快乐,而且是真正的快乐。陈聋子的“聋”不是装出来的,他没有这种被动的、刻意的痛苦,他是自自然然顺着本性过日子,该干活干活,不需人督促,当休息就休息,也不顾忌东家闲话,纯粹任心而为,安闲自足。他的快乐不建立在欲望的满足上,他是内心深处的清通和乐,所以他的快乐才永恒。梁漱溟说:“真正所谓乐者,是生机的活泼。”“乐是在心上,人不要去找,放下找的时候便是乐,便是新。”^{[4]p55-56}《菱荡》中聋子的自然和乐显然是达到了人生的平和状态,这才是大德之人。

在《庄子·人间世》中,有个支离疏者,“颐隐于脐,肩高于顶,会撮指天,五管再上,两脾为肋”,但是他却能在残酷的社会中达到“夫支离其形者,犹足以养其身,终其天年。”可见,在普通人看来,残疾是缺陷,但是缺陷有时候也是一种优势,所谓,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这种靠残疾避祸的人物形象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也有。韩少功的《爸爸》中的丙崽是一位残疾人,一个又丑又傻又哑长不大的怪物。“三五年过去了,七八年过去了,他还是只能说这两句话,而且眼冒无神,行动呆滞,畸形的脑袋

倒很大,像个倒竖的青皮葫芦,以脑袋自居,装着些古怪的物质。”他的行动很吃力,“他轮眼皮是很费力的,似乎要靠胸腹和颈脖的充分准备,才能翻上一个白眼。调头也很费力,软软的颈脖上,脑袋像个胡椒碾锤晃来晃去,须沿着一个大大的弧度,才能成功地把头稳稳地旋过去。”在鸡头寨的正常人看来,丙崽是出气筒,是被欺侮的对象,而且还准备拿丙崽的头祭谷神,但是不料正要动手,天上响了一阵雷声,于是,丙崽被视为通神之人,被寨子里的后生抬到祠堂前,成为丙大爷、丙相公、丙仙,接受众人的跪拜。在两寨打冤过程中,鸡头寨大败,许多后生死掉了,而丙崽最终得以逃过一劫。“丙崽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了——他居然没有死,而且头上的脓疮也褪了红,结了壳。他赤条条地坐在一条墙基上,用树枝搅着半个瓦坛子里的水,搅起了一道道旋转的太阳光流。”如果说小说写出了因他的畸形而备受欺侮,而写出他通神的特质则暗示出丙崽自身生命力的顽强。傻子的弱势与超人的神力就矛盾地统一在他身上。残疾的丙崽自然不能参加打冤,得以躲过一劫,而在村民打冤失败准备把怨气撒在他身上时,又得到了贵人相助再次逢凶化吉。丙崽的生存境遇的变化自然体现出庄子的辩证哲学观。

阿来的《尘埃落定》中也塑造了一位因傻得福的“傻子”,他本是土司父亲醉酒时与汉人母亲所生,生下来时,几个月不笑,表现异于常人,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十足的傻子。因为作为土司的二儿子,一生下来就意味着与老土司的潜在继承人大哥争夺土司之位,所以“傻”是他的护身符。傻子有这样的认识:“除了亲生母亲,几乎所有人都喜欢我是现在这个样子。要是我是个聪明的家伙,说不定早就命归黄泉,不能坐在这里就着一碗茶胡思乱想了。”也正因为傻,给他带来了安全和平静。“好在,我的傻能使心灵少受或者不受伤害。一个傻子,往往不爱不恨,因而只看到基本事实。这样一来,容易受伤的心灵也因此处于一个相对安全的位置。”因此,他对聪明人的看法则颇有哲理。“在我看来,聪明人就像是山上那些永远担惊受怕的旱獭,吃饱了不好好安安生生地在太阳下睡觉,偏偏这里打一个洞,那里屙一泡尿,要给猎人无数障眼的疑团。可能到头来总是徒劳枉然。”与傻子的快乐成长相比,傻子的大哥是注定要当土司的,所以他太多计较,太多计较的人必须欲望实现了才快乐,而欲望无止境,满足总有限,故快乐短暂,痛苦长久。在他与其他土司的争夺土地的枪战中,尽管表面上获得

了胜利,但实际上却失败了,他暴跳如雷,以至于生病。相反,傻子无忧无虑,获得了所有仆从的喜爱与尊敬。事实上,傻子并非没有头脑,只不过他们的头脑运行起来跟大多数人的运行不合拍不协调;他们不是没有事理的推断力,只是他们的推断跟大多数人的推断不在一个方向上。傻子就是一个很有头脑的傻子,他有时办的事情比他的那个聪明的哥哥还要漂亮得多。在常人眼里的傻事,经由他去办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当大家都在抢种罂粟的时候,他却种了粮食。这样,土司之间的争斗就因为粮食成就了麦其土司家的势力,他因此也获得了自己最喜欢的女人。同时,他在边境开设贸易集市,也大获成功。聪明和傻子,似乎是鲜明的两极,其实在生活中,人们经常被这两极搅得头脑糊涂。也许从根本上说,人们更多的是把聪明误当作傻子之举,把明显的傻子行为奉为聪明。

三 结论

从《庄子》中的畸人形象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

畸人形象的比较中,可以看到,无论从通过畸人所表达的思想主题、描写手法以及畸人身上所体现的哲学思想、文化意义等方面,20世纪文学中的畸人明显受到了《庄子》中的畸人的影响。但是,作为一种传统文化资源,在20世纪这个中西、古今文学相互交融的发展过程中,作家们在塑造20世纪的“畸人”形象时除了对《庄子》中畸人的借鉴继承之外,而更多的是一种发展,作家对畸人赋予了更多的思想文化内涵。比如《爸爸》中的丙崽,尽管他抵挡了毒药而得以生存,但他永远处在一个十分悲惨的境地,成为大家欺侮、嘲笑的对象,作家在他的身上更多的是表达出从“肉体到精神都表现出一种永远也长不大的种族侏儒的特征,集中了民族劣根性中一切未曾进化完善的原始蒙昧的生理和心理的因素。”^{[5]p212}同时,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畸人”远远不止上面所提到的这些,在曹禺、老舍、路翎、王安忆、苏童、马原、迟子建等作家的作品中也塑造出了许多“畸人”,并呈现出各自独特的审美形态。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2007.
- [2]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 [3]鲁迅.狂人日记[A].鲁迅全集(第1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4]李渊庭,阎秉华.梁漱溟先生讲孔孟[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 [5]於可训.中国当代文学概论(修订版)[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Zhuang Zi and the Image of Deformed and Abnormal Beings in the 20th 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

HUANG Gui-xiang¹, ZHOU Hong²

(1.Xichang NO.1 Middle School, Xichang, Sichuan 615000; 2.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13)

Abstract: In Chinese Classics *Zhuang Zi* various deformed or abnormal beings are portrayed. They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one category is the physically disabled; the second category is the psychologically deformed madman. In the 20th 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 there are these two types of images, which can be seen a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heme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deformed and abnormal beings images expressed in *Zhuang Zi*.

Key words: *Zhuang Zi*; Deformed or Abnormal Beings; Chinese Literature in 20th Century

(责任编辑:周锦鹤)